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从“大不列颠”到“酷不列颠”

——英国如何塑造国家形象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 丑则静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这个领土面积仅有24万平方公里的大西洋上安详的小岛，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却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始轰隆作响；在这里，斯密笔下“看不见的手”开始搅动世界经济风云；在这里，牛顿家后院坠地的苹果牵引出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同英国历史上这些伟大的名字相比，长久以来世人心中英国的形象往往是保守与理性，英国人的形象也往往是呆板与沉闷。为了改变这一传统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开始通过全球营销、文体创意、人文熏陶等方式推广“酷不列颠”与“非凡英国”，让人们感受到英国在保守与理性背后的宽容和随性，英国人呆板与沉闷里隐藏的幽默和热情。

全球营销：打造“非凡英国”国家品牌

安娜可·艾利维斯是英国一家知名广告公司BMP的主管，在1994年由她主持策划的研究报告指出，国家品牌营销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个国家的国旗就可以作为国家商标，一国所进行的文化输出活动就可以被视为大型的广告推广活动。这份报告的观点随着1997年工党新任首相布莱尔的执政而被公众所知晓，并逐渐成为新政府打造“酷不列颠”国家品牌的理论基础。这一国家品牌营销行动得到各政党与各级政府的广泛响应与支持，至2012年已经由单纯打造国家品牌升级为长期的、全球性的国家形象推广计划。

2012年2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揽子国家形象推广计划正式启动，致力于通过“全角度、多主体、精目标”的方式，来打造“非凡英国”的国家品牌。第一，为突显英国国家形象的丰富性，“非凡英国”对本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遗产、乡村、音乐、体育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形成“文化是非凡的”“知识是非凡的”“绿色是非凡的”等多个子推介项目。第二，为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英国贸易和投资总署、英国旅游局主导策划，政府财政大力支持，同时吸收商业、创新与技能部、文化协会等多家机构和单位广泛参与。第三，相比于大水漫灌的品牌推广行动，“非凡英国”计划制定了相应的重点推介对象国与对象城市，通过传统的广告与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等方式，确保了“受众面广”与“点击量高”的良好宣传效果。

英国王室也是打造“非凡英国”国家品牌的重要形象资源。王室成员积极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传递幸福、勇气等被英国人普遍信奉的价值观；伊丽莎白女王等王室成员纷纷开通Facebook，以亲民、开放的方式与民众进行沟通交流。卡梅伦政府时期的文化大臣贾维德就曾指出，女王无疑是英国最佳的形象大使。

文体创意：塑造英国风情文化产品

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是创意经济领域的大师，在其代表作《创意经济：如何点石成金》一书中，对创意经济这一新经济现象作出了全面的分析，提出“创意经济每天会创造出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当文化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产品便被赋予了精神气质，随着这种产品走出国门，无疑将成为宣传一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的最佳名片。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政府率先将创意产业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在管理上趋于完善，在管理机制上，中央、地方、非政府的公共文化执行机构三级联动；在管理模式上，以“一臂之距”的原则进行政府对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在投资倾向上，英国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资具有鲜明的公益性与前瞻性特征。正是由于政府与民间的通力配合与协调联动，英国目前已稳居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强国之列，每年向世界输送无数精彩纷呈的文化产品。

“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他和他的戏剧是英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旅游一直以来是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旅游产品之一，2013年起每年大约有200万的国内旅游者和100万的入境游客走访莎士比亚环球剧院、莎翁故居等与莎士比亚戏剧相关的文化景点。在体育领域，伦敦也利用第三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将富含英国元素的各种文化产品融入到奥运会的各个环节之中，使伦敦奥运会本身成为一个“英国制造”的文化创意产品。例如，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创意灵感直接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以戏剧的方式将“英国制造”、英式幽默、披头士、哈利波特等英国文化符号集中展现，打造了一幅专属于英国的文化地图。

人文熏陶：传播英伦特色生活方式

罗宾斯勋爵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任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负责主持起草英国高等教育前景规划。1963年《罗宾斯报告》发表，英国不但由此打开了本土学生赴国外留学的大门，也开始招收来自欧、亚、非洲等非英联邦国家的学生。该项政策的直接目的主要是意图通过放宽留学政策与资助外国留学生等方式继续保持英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但随着外国留学生的到来，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缜密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和独特的英式生活与价值观念，都“成为涂抹在留英学生身上的油彩，打上了永远也消除不了的烙印，其深远的文化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英国作为高等教育的故乡，拥有着世界范围内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英国也长期主导全球科研的脉搏，并不断向世界输送“领导力”。在上世纪末，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继《罗宾斯报告》开启英国教育全额收费时期后，1999年布莱尔政府又推出了“国际教育首相倡议计划”（以下简称“首相倡议计划”），积极重塑英国教育结构，开启了英国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战略时代。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改进，辅以保护性、限制性以及差异化措施与一系列商业性教育机构，首相倡议计划已完成两期，在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成效显著。

“英国的大学教育是英国对世界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据统计，世界上1/7的国家元首曾经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非英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13%曾经学习或供职于英国高校。可以说，每年英国吸引大量来自全球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有效地拓展了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提升着英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以英国首都伦敦为例，在这座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会里，帝国理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二十余所世界级名校汇聚，而所有就读、访问、工作于此的各国学者无不留恋于博物馆区，去大英博物馆探寻埃及罗塞塔石牌；漫步于泰晤士河边，享用一份英式下午茶；去拜访福尔摩斯博物馆，抑或在披头士曾走过的艾比路上留一张合影；在周末的傍晚走进一家小酒馆与当地人畅聊，去感受英式幽默的独特魅力。所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熏陶与培养着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年轻人，也正是因为此，英国高等教育已成为英国国家“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战略视角

地下管廊：一个城市的良心

□ 李志明 杨思涛

雨果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地下管网状况反映了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心，也是城市持续竞争力的重要表现。所谓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就是指在城市地下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解决“马路拉链”和“空中蜘蛛网”的根本手段，对于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功能完善、规模庞大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并成为国外发达城市市政建设管理的现代化象征和城市公共管理的一部分。

欧洲国家的做法

欧洲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先进地区，特别是在市政设施和公共建筑方面更是如此。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就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首先出现在法国。1833年，法国巴黎政府为解决塞纳河污染问题，在建设整个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时，同步建设有足够空间敷设给水、压缩空气管、通信、交通信号等各种地下管线的综合管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早期地下综合管廊以结合排水道的半圆形断面为主，后来为适应现代城市管线的种类多和敷设要求高等特点，综合管廊的断面被修改成了矩形形式。经过探索、研究、改良和实践，其技术水平已完全成熟，目前，巴黎及近郊的地下综合管廊总里程已达2000多公里，建设规模位居世界城市之首。随着巴黎实践的成功，欧洲的许多重要城市，例如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汉堡、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挪威的奥斯陆等，也先后开始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并获得了极大发展。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建设，这些城市也都建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地下综合管廊系统。

在不断完善管廊技术的同时，欧洲城市还配套发展了地下综合管廊管理体制。例如，在英国、法国等国家，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被作为公共产品范畴，由政府出资建设。在地下综合管廊建成后，城市政府往往将廊位出租给各管线使用主体（出租价格根据实际情况逐年调整），通过这种方式收回部分投资成本。为加强对地下综合管廊的管理并提高其利用率，欧洲国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在设有地下综合管廊的地段敷设管线时必须入廊，而不得直埋敷设。

亚洲国家的做法

在亚洲，日本的地下综合管廊（日本称“共同沟”）建设经验丰富，并且以规划先行、法规完善和技术先进而著称。

1926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针对地震导致的管线大面积破坏，从防灾角度在东京都复兴计划中规划建设综合管廊，将电力、电话、供水和煤气等管线集中铺设。如今已投入使用的日比谷、麻布和青山地下综合管廊是东京最重要的地下管廊系统。例如，采用盾构法施工的日比谷地下管廊建于地表以下30多米处，全长约1550米，直径约7.5米，如同一条双向车道的地下高速公路。日本其他大城市，如大阪、京都、名古屋、横滨、福冈等均大量投入综合管廊建设，日本全国已兴建超过2000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

在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时，日本非常重视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早在1963年就制定了《关于建设共同沟的特别措施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日本相关部门需要在交通量大及未来可能拥堵的主要干道地下建设“共同沟”。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指导下，日本政府负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出资建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负责国道和地方道路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费用），后期运营管理则由政府与管线使用主体共同负责（国土交通省下属专门的道路管理部门负责综合管廊公用设施的日常运营维护，各管线使用主体自行负责管廊内各种管线维护）。

此外，城市国家新加坡也十分重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正是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需求未到、基础设施先行”的市政建设理念，并辅之以严格的规划许可制度，新加坡将位于滨海湾、3.9公里长的地下综合管廊建成了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的“生命线”。

几点启示

一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要有综合性、统一性和前瞻性的规划设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必须要重视规划，未建设先规划并预留未来使用空间。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划必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布局中，并综合考虑城市现有和未来的人口、资源、技术以及管线需求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将近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相结合，并与地铁、地下通道等城市地下设施规划相协调和衔接，只要有条件就应尽可能与其他地下设施同步合建。

二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国外经验表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离不开详尽而有效的地下空间管理法律法规作为指导，以此规范城市地下管线投资、建设和运营行为，完善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管线使用主体、管廊运营维护主体等在内的各方主体的责任义务划分以及争议解决机制等，并同时建立和完善应急事件处置机制和预案。

三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需要建立合适的投融资模式。一般来讲，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额都较大，完全由政府来买单并负责运营和管理的财务可持续压力会很大。许多发达国家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的原则，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收益机制，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将地下综合管廊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在各管线使用、受益主体间进行合理分担，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保障地下综合管廊的可持续运营。

四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需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由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用周期很长，往往能够达到100年左右。在如此长的周期内，无论地下综合管廊运营权交给哪类主体，政府主管部门都必须加强对地下综合管廊运营主体和运营过程的有效监管。在完善应急事件处置办法的同时，加强运营成本审查，有效引导运营行为，提高地下综合管廊维护质量，使地下综合管廊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寿命，杜绝运营中断现象发生。

他山之石

提升大国货币政策效率亟待重构货币之锚

□ 陈建奇

伴随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影响不断增大，汇率变化对各国商品竞争力的扰动日益突出，大尺度调节货币政策或者汇率水平都可能对外产生剧烈冲击，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导致全球资本跨境无序大规模流动。G20峰会多次将货币政策作为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内容，意在放大货币政策正面溢出效应，最大限度降低负向溢出效应，同时，极力倡导世界各国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然而，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的选择具有内在的联系，单方面的政策协调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厘清两者内在的关系，再放到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中进行分析，由此才能得到更客观的结论。

大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内生汇率市场化诉求

关于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给出了答案。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与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只能取其二，即三者不可同时兼得，如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那就必须以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作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实行美元双挂钩体系，美元与黄金保持固定兑换，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监督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世界资本流动受到较大管制，由此避免对汇率的稳定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各国实现了汇率固定、资本流动管制的目标，赢得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0世纪70年代美元双挂钩体系崩溃以后，全球资本流动日趋自由化，但世界各国采取的汇率制度并不一致，一些小型经济体采用了联系汇率制为特征的固定汇率制，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国则采取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小型经济体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国等大国则将独立的货币政策置于优先地位。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即什么经济体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小型经济体通常是外部价格的接受者，他们与自身经贸关系密切的大型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同周期性，通过盯住该大型经济体货币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有助于营造稳定的经贸环境，可以跟随该大型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而实现物价稳定等宏观目标，因而可以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

然而，大型经济体不是外部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影响者，与全球诸多经济体具有密切的联系，较难借助其他单一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来实现自身的物价稳定等宏观目标，因而大型经济体往往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代资本跨境自由化流动的背景下，美国、日本、英国等大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现了大国对于独立货币政策的重视。

当前提升大国货币政策效率亟待重构货币之锚

发达国家为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但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增长持续分化，汇率面临着大幅波动的挑战，各国被迫加强汇率协调以避免汇率过度波动，但此举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独立的低效率问题。特别是当前欧洲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不仅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而且实施了负利率的极端政策行为，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引发全球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越发突出，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的压力加大，但日元汇率却并未跟随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行为而出现大幅贬值，汇率市场非常规波动滋生各国对国际金融环境稳定性的担忧，加强汇率协调成为当前G20峰会等治理平台的关注重点。

如何避免汇率竞争性贬值成为汇率协调的核心。然而，如何评估一国汇率是否出现了竞争性贬值？在20世纪70年代牙买加协议之前，世界各国货币与黄金保持直接或者间接的挂钩，如果一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关系出现较大波动，那么可以认为该国货币出现了非常规的变化，必须采取相关的政策举措以保持稳定。但牙买加协议规定黄金不再是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转为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世界各国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汇率衡量的是一国货币与其他经济体货币之间的相对兑换关系，在此背景下，汇率如果出现了大幅波动，既有可能是自身货币政策或者其他政策引发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其他经济体汇率波动或者其他宏观因素波动的影响，货币是否出现竞争性贬值的问题也就较难衡量。

理论上评估一国货币是否出现了竞争性贬值的问题，核心在于测算该货币的均衡汇率，如果汇率较大幅度低于均衡汇率，那么该货币可能就存在竞争性贬值的问题。但目前理论界尚未寻找到测算均衡汇率的方法。在均衡汇率较难确定的情况下，倡导各国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就较难落到实处。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欧洲、日本都实行了负利率政策，这些非常规政策究竟对均衡汇率造成多大影响，目前还没有办法进行客观评估。在此背景下，避免竞争性贬值往往理解为保持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出现大幅波动。然而，如果保持汇率稳定，那么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下降的问题，货币政策低效率也就难以避免，这或许能够部分解释近年来为何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效率较低的问题。

为了解决当前货币政策低效率问题，不能简单地放弃全球汇率协调机制而任其自行波动，否则可能出现各国货币汇率内生性互相影响，促使汇率无序波动甚至引发部分国家汇率危机等问题，结果是世界各国汇率可能出现对均衡汇率的大幅偏离，国际金融环境稳定性将面临重大挑战，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低效率的问题难以解决。为此，各国应创新协调方式，重构货币之锚为评估均衡汇率提供参照系，比如重构货币黄金之锚，如果某一时点货币与锚之间过度偏离常态水平，那么可能就可以认为存在货币操纵或者非常规波动，在此基础上，通过货币政策等协调让其回归常态水平，既实现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目标，也实现汇率围绕均衡水平波动的市场化目标，确实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

热点透析